

# 憶張達文教授

文/楊信男

(這是我在清華大學物理系於 2006 年 2 月 14 日為張達文教授所舉辦的追悼會中所發表的懷念稿。)

我今天的心情是傷感中帶著迷惘。因為我所認識的張達文一直是健碩、爽朗、充滿衝勁、精力無限的一個人，怎麼會在 2004 年 7 月中旬突然來個 email 告訴大家他得了胃癌，需要入院動手術，希望大家祝福他，然後一切就急轉直下，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就離開了人世。生命的脆弱與無常，實在令我感到迷惘。

雖然我比達文整整大了十二歲，但是由於我們對許多事情的看法、觀念相近，所以我們從認識之後，很快地就變成無所不談的知心好友，他對事情的看法和做事的方法，常常給我很多啓示，現在突然失去了這樣一個知心益友，真的叫人感傷不已。

我在 1977 年回到台大物理系任教，而張達文在 1976 年從台大物理系大學部畢業，所以我原先並不認識他。1992 年侯維恕教授回到台大任教，和我同一辦公室，才從他的口中，知道台大物理系有這麼一位傑出的年輕系友。第一次見到張達文是在 1993 年春天，當時張達文已決定離開西北大學回國服務，台大與清大都希望能爭取他的加入，因此我們邀請他到台大演講並跟大家認識談談。我沒有機會跟他深談，只記得他曾批評國民黨鴨霸，橫取了他祖父的許多房產。當時雖然聽侯維恕教授對他學術成就的許多讚美，但由於不是同行，而諸多跡象也顯示他會選清華而捨台大，所以並沒有特別去留意他的事情。真正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1993 年夏天，我曾順道訪問法國 Saclay<sup>1</sup> 一天，去看看一些老朋友，因為我曾在 1983 年訪問 Saclay 半年。當天下午和大家閒聊時，一位做高能理論的朋友向我說，“恭喜你們台灣爭取到了達文，其實我們也很想爭取他來 Saclay，只是他執意要回台灣。”我聽了心頭為之一震，因為 Saclay 的中高能理論組不

僅在法國首屈一指，也是歐洲僅可與 CERN<sup>2</sup> 理論組抗衡的地方。我心想“哇，張達文的學術成就原來高到讓遠在歐洲的物理重鎮 Saclay 都想爭取他，真是了不起！台灣運氣真好！”不過我還是先回答說：「西北大學不想留他嗎？」Saclay 的朋友們齊聲回答說「那是他們不識才！」

可是我在為台灣物理界能夠獲得像張達文這麼傑出的年輕理論物理學家加盟慶幸之餘，卻不免擔心他會很快地被台灣環境的各種有形、無形的枷鎖消磨殆盡。可慶的是，由於達文超強的意志力與衝勁，很快地克服各種困難，除了在個人的研究工作上繼續發光外，也馬上發揮他的領導魅力，在台灣的粒子與場論界創造出第二次風潮。80 年代末期，在中研院李世昌與鄭海揚教授的領導之下，國內的粒子與場論界風起雲湧，我稱之為第一次風潮；張達文所引發的第二次風潮基本上將粒子與場論的主要舞台由中研院搬到新竹來。第二次風潮與第一次風潮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參與第一次風潮的年輕人主要都是在國外獲得博士者，而第二次風潮則造就了許多國內的年輕學生，像陳泉宏、栗育力、栗育文兄弟、周宗憲、張維甫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目前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羅亦安當時也深受張達文的影響。張達文做到了讓粒子物理與場論在國內生根，除了歸功於他的個人學識與旺盛的活力之外，他天生所具有的領袖魅力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我覺得這在國內物理界是很少有人能及的。

張達文在粒子與場論界所造成的風潮很快地受到大家的矚目而被推選為物理學會會長，亦被國科會邀請擔任審議人，而他也發揮他特有“敢衝、敢拼”的風格，在任內立下不少建樹。我知道由於達文的“不官僚”

作風，常令國科會的一些行政人員有跟不上的感覺。

除了物理專業領域的研究之外，張達文在其他各方面亦均有涉獵，不管是科學史、哲學史或人文、社會科學方面都有濃厚的興趣，更喜歡寫詩，中、英文詩作均曾刊登於文學刊物中，所以他不是一位狹義的物理學家而已，而是以自己專業上深厚的涵養為基礎，一直不斷地向四面八方拓展的全方位知識份子。

除了對學識與真理的追求之外，張達文對社會公義也很堅持。在他成長的過程及至長大成年，台灣社會上的不公義現象主要與當時主宰台灣社會的威權統治有關，所以他對國民黨政權一直有強烈的不滿，既使冒著有可能被列入黑名單的危險，他仍然無所畏懼。他告訴我說，當年任教於 Carnegie Mellon 大學的陳文成教授，在 1981 年夏天返台探親被警總約談後冤死在台大校園時，陳文成在 Pittsburgh 的房子便是暫托張達文代為看管的。

對於國家機器暴力的深惡痛絕，除了表現在反抗台灣以前的威權統治之外，張達文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也一樣不假以辭色，所以他雖曾經因為跟大陸物理學家一起合作發表過論文而得到大陸的科技獎，但是他的中國同儕都知道他對台灣主權與民主政治的堅持。他對台灣被迫以“The Phys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的名義參加 IUPAP<sup>3</sup> 一直耿耿於懷，認為接受此名稱基本上等於接受台灣被地方化，有損台灣的主權。所以他跟我在 1999 年秋天一同代表物理學會出席 IUPAP 第 22 屆大會時，便趁機積極跟 IUPAP 會長 Nilsson 以及代表中國出席會議的周光召及陳佳洱交涉，終於獲得 IUPAP 與中國的同意，在以後的 IUPAP 大會中，稱呼台灣與中國的簡稱應該為 China (Taipei) 與 China (Beijing)，以表示雙方完全對等。後來在柏林舉行的第 23 屆 IUPAP 大會，德國主辦單位以 Taiwan 與 China 稱呼雙方。去年在南非舉行的 IUPAP 大會則採用了 China (Taipei) 及 China (Beijing)。

張達文對社會公義的堅持，除了表現在對威權政治的反抗之外，也可以從他對環保與弱勢團體的關心

中看出。他一直很嚮往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這個團體所揭櫫的信念，也希望在台灣能成立類似的組織。2002 年，張達文、鄭天佐、王秋森（前台大公衛學院院長）、高涌泉與我個人所成立的碧水學社，便是基於這些信念而組成的。

李遠哲最近說，“我的心中只有科學和國家發展。”張達文也是這樣的一個人。不過我覺得用英國大哲學家羅素的一段話來看張達文的一生可能更為貼切。羅素在他的自傳中，以這樣的一段話做為開場白，他說：「支配我一生的是三個簡單而強烈的情懷 (passions)：對愛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以及對人間疾苦無可釋懷的憐憫。」後二者對知識無止境的追求以及悲天憫人的胸懷，可以說是驅使張達文一生的兩個主要動力。對於愛的追求，我想說一個小故事。去年 12 月 28 日晚上，也就是達文過世的前一晚，我又去他的病房探望，跟張太太談了很多。那時張太太已經知道達文不能再撐太久，所以她說，“我希望達文能夠帶著他的聰明、才華和熱誠，再投胎回到這個世界上為人類服務，我也希望他能夠再來找我。”我想在愛的追求上，達文應該是死而無憾了。我希望張太太的願望很快地能實現。達文，我們永遠懷念你。

註 1：Saclay 位於巴黎近郊，法國原子能委員會在該地設立有一個法國最大的國家實驗室。

註 2：CERN 為歐洲粒子物理實驗室的簡稱，位於日內瓦，擁有世界最大的粒子加速器，橫跨瑞法兩國邊境。

註 3：IUPAP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 為國際純物理與應用物理聯盟之簡稱，由世界各國之物理學會聯合組成。

---

作者簡介：

楊信男

台灣大學物理系

E-mail: snyang@phys.ntu.edu.tw